

1996—1997 年 北京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王 煜

1996 年和 1997 年对我国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1996 年是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开端年，1997 年我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召开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两年的发展情况不仅会影响本世纪最后几年的发展，而且将对下个世纪中国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以此为基本出发点，我们根据社会领域各部门、各专题、各阶层的研究报告对北京的社会形势进行分析与预测。

一、1996 年北京社会形势的基本判断

1996 年是“九五”计划的第一年，全国经济形势良好，党中央高举精神文明建设的大旗，社会发展态势平稳。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之下，端正指导思想，增强服务意识，围绕“两个转变”，清理思路，狠抓落实，把精神文明的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降低物价上涨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政治平稳，社会安定，市民心态明朗，未出现太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同时也应看到，人口和就业压力不断增大，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市民参与政治的热情降低，反腐败和社会治安任务还很艰巨，

社会价值观出现偏差，精神文明建设面临许多困难。诸多因素构成各种社会问题，不能不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

二、1996年北京社会形势的主要特征

1. 北京社会发展水平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评价结果，“八五”期间 1991—1995 年北京市的社会发展水平一直在全国领先，高出全国平均分 60—80 分。这一社会发展水平是以环境、人口、经济基础、收入分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卫生保健、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社会治安为十项指标加以测算的。根据这一测算，北京在收入分配、劳动就业、文化体育、环境、社会保障、教育科技等指标上，多年居于全国第一，十项指标中的八项多年位居全国前三名。

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指标专家的推算，近年来北京市的社会发展水平居全国第一。这一社会发展水平是以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五大指标（内含 46 个分指标）加以测算的。根据这一测算，1995 年北京在社会结构和人口素质方面位居第一，生活质量方面位居第二，经济效益方面位居第三。可以说，两种社会指标体系对北京的社会发展水平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据推测，1996 年北京将继续居于全国前列。作为全国的首善之区，这一位置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也应看到，用 20 个指标综合指数增长来看社会发展速度，1991—1995 年北京居于全国第 16 位。因此，对北京位居全国第一的社会发展水平决不可以自满自足。

2. 经济既保持快速增长，又有效地降低了物价上涨幅度，经济运行总体质量有了提高。

1996 年北京市的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可达 16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9.1%，实现了预定的目标。与上年相

比第二产业增长 8.3% 第三产业增长 12.1% 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 50.9%，产业结构进一步得到优化。宏观调控措施成效明显，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 7.3% 比上年回落 5.3 个百分点，是近年来第一次实现零售物价涨幅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率。利用外资水平大为提高 全年实际利用 22.5 亿元 境外投资已成为促进北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城市建设重点突出，八达岭高速公路已通车，首都机场扩建工程初见规模，安居工程进展喜人，朝内、崇外、阜外等道路改建抓紧进行。财政收入高速增长 收入增幅高出支出增幅。教、科、文、卫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预计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 6885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3600 元，均比上年同期增长 5%。

3. 人口继续增长，人口素质有所提高，流动人口数额庞大。

到 1995 年底，北京市人口总数已突破 1250 万人。人口继续增长 同时密度分布向外扩展。在出生率、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的同时 计划生育率、独生子女率和晚婚率继续提高。同时 迁移人口的增加也在下降，但在总人口增加中的比重却在上升，已占到 72.94%。

目前，我市人口的年龄构成继续向老年型转化，14 岁以下少儿占总人口的 19.61%，65 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7.84%，年龄中位数为 33.45 岁。我市人口文化构成较高 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人口在每 10 万人口中为 13349 人 远远高于其他省市；同时 人口的职业构成发生较大变化；“八五”期间 农村人口下降 1.6%，工人下降 5.23% 商业人员上升 2.28% 反映了产业结构的变化。

北京市的外来流动人口已达 329.5 万人，在京居住的为 287.7 万人 从事务工经商的为 215.8 万人。与北京市常住人口相比 在城近郊区每 3 人中就有一个外来流动人口，在远郊区县每 9 人中有一个外来流动人口，数额庞大的流动人口已经融入北京，成

为城市共同体的一部分。

4. 政治形势平稳，反腐败取得巨大成绩，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1996 年北京市相继召开了市委七届八次全会，市人大七届四次会 议 市政协八届四次会 议等重要会议。贾庆林等一批重要干部到位，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进一步调整和充实。乡镇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如期举行，政治生活进展顺利。陈希同、王宝森事件的恶劣影响已经基本消除。

今年的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成效。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六条规定出台，公款“吃喝玩乐”风有所遏制，清理领导干部违反规定乘坐小汽车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清理领导干部住房方面以权谋私问题的 工作深入开展，贯彻收入申报、礼品登记和企业招待费报告制度初见成效。同时，处理干部违纪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纠风工作中，检查了公路“三乱”情况，重点治理了中小学乱收费，对预算外资金实行了检查，狠刹利用公车办婚事的不正之风取得初步成果。

1996 年以来，针对严重暴力、抢劫、流窜、重大盗窃，特别是涉枪犯罪和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侦破了一大批案件，抓获了一大批逃犯，打掉了一大批团伙，整治了一批治安乱点和外来人口聚居区，使得社会秩序明显好转，刑事案件有所下降，群众安全感增强，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社会效果。同时，打击偷盗自行车犯罪、收缴非法枪支、打击卖淫嫖娼、制黄贩黄、禁止异性按摩、整顿外来人口聚居区等专项斗争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火灾下降，交通死亡减少，治安状况的好转成为社会形势稳定的重要因素。

5. 社会保障的改革取得新成绩。

我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已从国营企业扩展到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并建立了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新机制，已有 266.7 万职工和退休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统筹。企业职工失业保险

也已扩大到各类城镇职工 参加失业保险的 已达 216 万人。医疗保险以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为突破口，已有 179.6 万职工和退休人员参加统筹。工伤和生育保险制度也在完善之中。与此同时，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改革也已起步。社会救济和优抚的标准提高，社会福利事业稳步发展。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建立。

由于本市国营大中型企业效益下降，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多，失业、半失业、下岗待工人员不断增加，使得困难企业职工生活保障和富余职工安置问题更加突出。到上年底，本市为 7.2 万名下岗职工借支生活费 2724.5 万元 为 1.1 万名失业职工发放 1143 万元救济金和医疗补助费。还为困难职工发放生活费，为支持分流下岗人员贷款贴息 分流 5786 人。

6. 市民各阶层心态平稳。

北京是首都，市民文化素质高，公众参与政治、社会活动一向比较积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关心经济利益的人越来越多 政治参与的意愿和政治功效感逐年降低。但是 对于国家、政治制度和执政党的认同程度较高，而且相当稳定。这种认同感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同时，随着改革的进程，市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加强，如今各种改革措施已不再引起过多的议论，抢购更成为鲜有之事，倒是足球和股票使市民倾入了更多的关注。

随着下海热、经商热、房地产热的降温和经济秩序的整顿，市民的浮躁心态也趋于平稳。

7. 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果。

1996 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北京市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取得较好效果。《首都市民文明公约》的颁布规范了市民的行为准则，文明社区的建设走上正轨。市民文明学校遍地开花，创建文明单位、创建文明村镇、军民共建等活动持续开展。“见义勇为好市民”活动弘扬了正

气，“城市清洁日”环境整治活动美化了环境。“做现代文明北京人”双休日活动吸引了众多的市民；“评选精神文明建设最佳活动”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承诺制行动广泛开展，“学习李素丽 服务创一流”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青年志愿者行动、文明修身工程等在青年和大学生中十分活跃。

与此同时 取缔和关闭录像厅、整顿电子游戏厅、扫黄打非、禁止异性按摩、查处“三陪”色情服务等净化了首都的文化环境。持续八个月的“严打”斗争更为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1996年北京社会形势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人口和就业压力不断加大。

根据“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北京市在2000年户籍人口控制在1125万人以内，2010年控制在1210万人左右。1995年底，户籍人口已达1170.5万人，因此控制人口的任务十分艰巨。就人口的增长而言，由于计划生育率、独生子女率和晚婚率极高，人口自然增长可控的潜力已经不大，关键在于控制迁移人口。近年迁移人口的增幅在下降，但绝对数量仍不少。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应该逐步取消城乡户籍分割，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化壁垒，这与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实际人口的增长必然形成尖锐的矛盾，实在是北京面临的大问题。

北京市的就业压力来自以下几个方面：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约2.46万人；国有和集体企业内部多余职工据预测为23万人；全市下岗待工人员约10.8万人；地方所属国有、集体企业中停工半停工企业存在大量下岗待工人员；外来流动人口已达287.7万人，其中务工经商者215.8万人，占据了相当的就业岗位；1997年预计外省市进入本市城镇务工的劳动力为100万人；本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约30万人，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将进城务工；每年适龄进入劳

动力市场的青年也有相当数量。本市“再就业工程”实施一年多，已使 11.7 万企业下岗待工人员和社会失业人员重新有了工作岗位，但与现实面临的就业压力相比，任务还相当艰巨。

据北京社会心理所的调查，把失业视为严重社会问题的人，1993 年只有 3%，1996 年已达 43.49%，失业作为社会问题的排序由 14 位上升到 7 位。近三成人员害怕失业、下岗，形成失业焦虑和失业危机感，就业、失业的压力已波及到在职人员。

2. 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形成潜在的社会问题。

1996 年北京市居民的收入平稳增长，人民生活质量继续提高。预计人均生活费达 6885 元，比去年增加 5%，支出的恩格尔系数为 46.53%，比去年降低 1.4%。与此同时居民家庭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10 月，高低收入户之间，收入比扩大为 3.5 倍，绝对额由 6654 元扩大为 7183 元；收入标准差已达 215 元，比 1995 年扩大 37.2%，高低收入户食品支出额相差 897 元，恩格尔系数相差 20.7 个百分点，基尼系数 1995 年已达 0.3。这些数字表明，北京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由均衡向不均衡阶段发展。

同时，由于有些企业不景气，经济效益差，职工收入较低，有的家庭负担系数大；离退休和退养人员较多，失业下岗待工人员增多，一定数量的长期病残人员等，形成生活困难居民层，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全市人均实际生活费收入减收面有增无减，最低生活费标准以下困难家庭也进一步扩大。

目前，虽未形成明显的两极分化，但其潜在的影响不可低估。职工对当前社会分配不公强烈不满，有的消极怠工，影响工作积极性的发挥。据北京社会心理所的调查，市民对贫富容忍的程度已超过中等强度，成为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3. 反腐败和社会治安面临的任務还很艰巨。

腐败问题可以说是目前我国社会民众关注的焦点。根据北京社会心理所的调查，市民对政治状况的满意程度为 62.4（满分

100) 已连续几年下降 对官员的满意程度更低 并把以权谋私视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1996 年北京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思想上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形成“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 法制建设落后于反腐败形势发展的需要;监督体制不健全;执法执纪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

应该看到,当今的腐败已出现公开化倾向和行业化倾向,由权力的泛化产生腐败的泛化,进而成为普通民众效法的行为,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经过长达八个月的“严打”斗争 北京市的治安状况明显好转。此后市委、市政府作出“坚持严打”的决策 扫黄打非冬季行动拉开序幕,社会治安形势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观念上的拜金主义,社会管理、社会控制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刑事犯罪活动,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难以控制,社会治安问题仍比较多。刑事犯罪、经济犯罪、外来人口犯罪、毒品犯罪等,仍需注意。

从年中的调查看,54.9%的人对“严打”结果表示比较满意和很满意,64.9%的人认为“严打”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62.8%的人认为通过“严打”安全感有所提高。但是对治安表示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只占 27.2% 不满意的占 34.5%,超过半数的人感到安全和比较安全,30.8%的人仍然缺乏安全感 比例均低于对“严打”本身的满意程度。这反映出社会治安仍需加强,特别是在盗窃、抢劫、诈骗等涉及财产方面。

4. 社会价值观出现的偏差一时难以扭转。

随着金钱本位,利己主义和享乐思潮的泛滥,丧失理想,缺乏奋斗目标,成为部分人特别是部分青年人的通病。剧烈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不同年龄者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已形成了日益严重的代沟,形成了潜在的社会冲突。调查表明,市民对社会风气的满意程

度降低，而且年龄越大的市民越不满意。市民对家庭伦理道德的变化普遍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但对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评价不高，并忧心忡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和外来文化的影响，社会价值观出现的偏差可能进一步加剧。

四、趋势与对策

1996 年实现了“九五”计划良好的开局。在宏观大气候不变的情况下，1997 年北京市的经济工作将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性，做到稳中求进，稳步发展。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会继续增加。由于影响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存在，腐败现象还会继续滋生，社会丑恶现象一时难以禁绝。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加大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力度，失业、半失业、下岗待工人员也将继续增加。北京市在新的一年里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为此，建议北京市在决策时注意：

1.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十分注意维护工、农的基本利益，以保证社会的稳定。

目前我国社会一方面处于国民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另一方面也处于社会结构大转型的时期。市场经济的起步和发展往往会伴随许多不规范的行为，引起经济秩序的某些混乱。社会结构的转型也会带来社会群体的重新定位、人际关系的调整和经济、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工人、农民是我们社会最大的两个群体，是我国政权性质的基础，是我们政权的基本依靠力量。他们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市场经济的失落者。北京是首都，党政机关集中，事业单位众多，各类企业聚集，职工数量是比较庞大的。企业职工队伍在总体拥护改革的前提下，普遍具有失落感。他们对整体改革肯定，对具体改革有分歧，对完善改革表示欢迎。他们对祖国的前途乐观，对企业的现状不满，对个人的命运担心。他们对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理论拥护，对市场经济的现状疑虑，对市场经济的前景抱有希望。改革要注意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特别要注意保护亏损、破产企业职工的利益，保护低收入者的利益，以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

2. 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注意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发挥北京市民在这方面的优势。

近些年来，由于社会价值观的偏差、社会风气的混乱和社会公德的削弱，精神文明的某些方面出现下降和滑坡的趋势，引起公众普遍的不满和忧虑。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精神文明建设再次引起高度重视，增强了人们扭转滑坡局面的信心。有人说，“从南往北走，越走越保守。”与其他地方比，北京的国家干部多，知识分子多，国营企业职工多，文化素质高，社会风气较好，人文传统悠长，完全有条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完善社会主体价值观的过程中发挥主导和先锋的作用，为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特殊的贡献。

3. 抓“两头”，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社会分配不公。

北京市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3，如果加上农民，则基尼系数还会更高，已经达到中等不平等程度。应该说，我国还没有出现两极分化，但已存在高收入层和社会贫困层。高收入层，也称富人层，“款爷”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户、各种“倒爷”，明星、外资代理人等。社会对高收入层评价不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相当数量的高收入者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不成比例，所谓“不三不四挣大钱”，就是这个意思。二是相当数量的高收入者是违法致富、非法致富。这种致富必然是损害国家、社会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获得的。因此，一方面应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给社会贫困层以最低限度的保护。另一方面应从体制上、机制上、法制上采取有力措施，打击违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抑制富人层的非法暴富。北京市个人所得税工薪纳税人达 557 万人，人数不少，但真正

的高收入层往往不是工薪者，而是计划经济体制外各种渠道收入者。缓解社会分配不公，应从这部分人着手。

4. 加大反腐败力度，强化社会治安。

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关键是民心稳定。影响民心稳定的因素有多个。民意调查显示，社会问题评价呈多极普涨态势，但最严重的还是假冒伪劣和以权谋私。加大反腐败力度，加强反腐败工作的透明度，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反映着大众的期望。在打击刑事犯罪、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的同时，应探索社会管理的新思路、新方法。在当今社会，既然存在不同的阶层，就必然有不同的收入水平，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态度，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价值体系，不同的娱乐享受方式。因此，在社会管理、治安管理上，应该既有一视同仁的一面，也有因人而异的一面，既弘扬主文化、主旋律，也适当允许亚文化有一席之地。

（作者单位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北京社会发展形势综合评价与预测

郑 新 王 军 刘建英

1996 年北京社会发展平稳，总体态势较好。国民经济稳步发展，物价回落明显，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进展，社会治安形势明显好转，精神文明建设更加受到重视，《首都市民文明公约》正式颁布实施，一些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得到缓解。与此同时，社会发展中还面临着许多问题，有些影响稳定和发展的矛盾问题仍较突出。

一、社会发展形势的基本评价

1. 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居全国领先地位。

按照国家统计局地区社会发展水平评价结果，我市“八五”期间社会发展总指数一直居于全国领先水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60—80 分。其中收入分配、劳动就业、文化体育三方面连续五年居全国第一，环境、社会保障、教育科技有四年居全国第一。除经济基础、社会治安两个领域以外，其他八个领域在全国每年排名均在前三位之列（具体情况见下表）。这表明，北京作为我国政治、文化、对外交往的中心，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表 1 北京市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情况 单位: %

	1991 年	1992 年	1993 年	1994 年	1995 年
总 指 数	186.51	188.81	181.85	191.38	185.40
环 境	15.74	15.62	13.24	14.69	14.52
人 口	20.45	19.39	18.18	17.85	19.03
经济基础	25.33	25.73	21.38	24.44	22.38
收入分配	20.15	21.23	20.31	22.28	21.83
劳动就业	21.53	21.62	21.79	22.01	20.36
社会保障	16.97	17.37	17.37	18.55	15.81
卫生保健	18.65	19.41	18.92	18.30	19.70
教育科技	24.74	21.19	23.62	23.88	22.68
文化体育	15.63	17.30	18.58	17.60	18.68
社会治安	7.33	9.95	8.47	11.78	10.41

表 2 北京市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在全国位次

	1991 年	1992 年	1993 年	1994 年	1995 年
总 指 数	1	1	1	1	1
环 境	1	1	2	1	1
人 口	2	2	1	2	1
经济基础	1	3	4	2	2
收入分配	1	1	1	1	1
劳动就业	1	1	1	1	1
社会保障	1	1	1	1	2
卫生保健	3	2	2	2	2
教育科技	1	2	1	1	1
文化体育	1	1	1	1	1
社会治安	27	25	17	12	12

2. 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口素质得以提高。

“八五”期间，我市国民经济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1995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1394.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递增11.8%，比“七五”期间平均增速提高5.9个百分点，提前五年实现了经济总量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1995年社会劳动生产率20650元，比1990年翻了一番。1995年我市经济综合指数为22.3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八五”期间，我市人口综合指数一直保持较高水平，1995年为19.0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一倍多。我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控制在3.2‰以下，低于全国11.2‰的水平。计划生育各项指标：计划生育率、一孩率、晚婚率分别由1990年的96.42%、90%和74.52%提高到1995年的99.53%、93.24%和84.51%；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由1990年的12.43‰、5.81‰下降到1995年的7.92‰、5.12‰。人均受教育年限达8.59年，文盲率较1991年下降0.57个百分点，人口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3.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活质量继续提高。

“八五”期间我市居民在货币收入方面有了提高，消费结构日趋优化，居住条件、生存环境等方面得到改善。1995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5868.36元，是1990年的3.3倍，“八五”期间年均增长27%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8.9%；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24元，是1990年的2.5倍，年均增长20%，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4.8%。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1995年我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8.4%，农民恩格尔系数为49.2%，已接近小康水平。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1254亿元，平均增长53.4%，城镇居民人均住宅使用面积13.3平方米，比1990年增长18.8%。农村居民使用自来水人口比重已达98%。每万人拥有商业、服务业人员由1990年的567人增加到1995年的995.8人。

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实力的增强，近几年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据有关民意调查，39%的人认为收入与上年相比有所增加，20.5%的家庭储蓄有所增加，其它如股票、债券、高档消费品和金银首饰增加的比例远远高于下降的比例，正因为看到了改革开放光明的、主流的一面，人们对物价上涨的心理承受能力已明显增强。83.6%的人认为文化生活丰富或较丰富，84.4%的人关心国内外大事。

4. 就业结构得到调整，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

1995年我市从业人员达676.5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331.5万人，占全市从业人员的49.0%，比1990年增长8.4%，相应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人口比1990年下降4%和4.7%。与1990年相比，三资企业从业人员由7.1万人增至1995年33.2万人，私营和个体经营人员由6.3万人增至20.9万人，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我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有较大调整。

全市民政经费由1991年的1.6亿元，增加到1995年的4.8亿元，年均增长31%，职工及离退休人员保险福利费由1991年的48亿元增加到1995年的107亿元，年均增长22%。城镇社区服务设施增长3.4%。到1995年底，我市市属企业已有270万名职工参加了养老保险，覆盖面达89.4%，221万人参加失业保险，覆盖面达87%，6810户企业职工参加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全市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

5. 教育投入逐年增加，基础教育提前达标。

“八五”期间我市高等教育事业稳步发展，全市高校共培养大学生18.8万人、研究生2.9万人，分别比“七五”期间增长12.8%和22.5%；职业技术教育“八五”期间向社会输送各类人才22.4万人，比“七五”期间增长28.2%，1995年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为2.07:1，明显高于1990年1.4:1的水平，中等教育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1993年我市提前两年在全国率先普及

九年制义务教育。1995 年我市小学净入学率男女生均为 99.93%。小学完成率达 96.93% 其中男生为 95.69% 女生为 98.3% ,男、女儿童已享受平等教育;“八五”期间全市改扩建中学校舍 66.3 万平方米,比“七五”期间增加 8.2 万平方米,确保了在初中入学高峰未出现“二部制”。中学校舍危房率由 1991 年的 1.4%下降到 1995 年的 0.21%。小学教师合格率 94.89% 较 1991 年提高 4.23 个百分点。全市教育经费投入 25 亿元,比 1991 年增长 63.4%。1995 年教育综合评价指数我市为 22.68,居全国首位。

6. 医疗事业成绩斐然,居民健康水平明显提高。

1995 年我市拥有县以上医院 629 个,比 1990 年增长 22.8%,每千人拥有医生 5.06 人,高于东京 (3.6)、汉城 (1.1)、新加坡 (1.4) 等一些国际发达城市水平,每千人拥有病床 6 张,比 1990 年增长 12.1%。“七五”期间严重存在的“看病难”、“住院难”问题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缓解。居民保健水平得到较大提高,1995 年我市计划免疫四苗全程接种率达 98% 婴儿死亡率为 11.81‰ 孕产妇死亡率 0.19‰,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比 1990 年下降 49.73%,食物中毒平均发病率下降 44%,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 74.04 岁。居民健康状况主要指标均已在发展中国家居于前列,有的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7. 文化体育继续发展,文化消费逐年增大。

1995 年全市公共图书馆藏书 2629 万册,人均拥有藏书 2.5 册,接近东京、伦敦、莫斯科等国际大都市水平。全市共有博物馆 90 个 参观人次 3343 万人次,全市报刊发行数量 112577 万份,电视人口覆盖率 98.3%,节目套数 19 套,平均每周播出时间 630 小时,分别比 1990 年增长 2.7 倍和 2.9 倍。随着双休日的逐步实行,居民文化休闲消费所占比例逐年提高,1995 年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 511 元,比 1991 年增长 2.5 倍,农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 257 元,比 1991 年增长 2.6 倍。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得到改善,

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

8. 环保经费投入增大，环保质量保持稳定。

“八五”期间，我市用于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的投入达 70 多亿元，治理了 2000 多个污染源，使 73 个污染扰民工厂、车间停产或搬迁。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 1990 年的 4.24 平方米增加到 1995 年的 7.48 平方米，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由 1990 年的 53.7% 提高到 1995 年的 65.8%，在经济年均增长 11.8%，机动车辆增加一倍，人口、燃煤量和房屋建筑面积逐年增加的情况下，空气中的降尘量、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含量和“七五”期间基本持平。主要饮用水源保持清洁。我市在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这些成绩，实属不易。

二、1996 年存在问题与差距

1. 社会治安状况不容忽视。

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我市社会治安在全国的排名 1991 年为 27 名，1992 年为 25 名，1993 年为 17 名，1994 年和 1995 年均为第 12 名。虽然有了大幅度提高，但社会治安状况还不尽人意，许多人还缺乏安全感，交通事故居高不下，恶性案件时有发生，青少年犯罪人口增加。社会治安仍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据有关民意调查，对当前社会治安表示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 27.2%，表示不满意的占 34.5%，在目前的社会治安环境中感到很安全的和比较安全的占 55.4%，缺乏安全感的占 30.8%，这与首都的城市功能和社会地位不相适应。

2. 居民高低收入差距拉大。

居民人均生活费最高收入户收入和最低收入户收入差距由 1991 年的 2.16:1 扩大到 1995 年的 3.87:1，这表明社会收入差距拉大，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明显加大。

3. 我市人口已步入老龄化阶段。